

• 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专栏 •

编者按: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指出,“要充分认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报告同时指出,“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心理学对文化有颇多研究,也取得了许多很有影响力的成果。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发生发展,一方面受到其生物性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其社会性以及与之相联的文化因素的制约,表现为决定、中介、调节等影响过程。当然,文化除了具有制约性,也有开放性,随着人类境遇的变迁,人类心智的成长,新的文化元素也在不断创生、光大,旧的元素则不断式微、乃至消亡。另外,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强弱变换,以及它们对人类个体认知、情感和人际交往的显性或者隐性的影响,也都是各个领域心理学家所关注的。我们相信,心理学家在我国的文化建设中,一定能够利用各自学之专长,发挥聪明才智,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建言献策;同时,也能把握住历史机遇,加强文化与心理科学的研究,是中国心理学在相关领域能够做出自己创新性贡献。

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倡议下,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有关领导和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领导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心理学界的三家一级学(协)会于2012年1月16日举办了“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与会各方专家畅所欲言,都表示十分赞同心理学界要加强沟通,体察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规划,促进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心理学的独特贡献。现将与会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记录入史,供人们参考!

(本专栏责任编辑:张建新)

“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

史占彪 祝卓宏 闫洪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为了研讨如何在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发挥心理学学科优势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月16日,一场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发起并主办,三大心理学一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共同协办,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承办的、以“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为主题的高规格学术研讨会在心理所召开。

此次会议共有来自心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杭州疾控中心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心理所副所长张建新研究员主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统战(群工)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孔冈,中国科学院工会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霍妍丽到会指导。

与会专家从文化的内涵、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的关系、心理学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做了深入探讨。专家们指出,文化强国的战略是心理学学科发展的契机,心理学工作者应该特别抓住这个机

遇,让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同时,心理学工作者需要提高对社会转型历程的敏感度,全面讨论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揭示个体、群体和社会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文化在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重建方式。

专家们还提到,在研究文化建设的时候,既要意识到文化对人们的重要影响力和塑造能力,更要充分考虑到文化的科学性、传统性和时代性,重视科学规律,尊重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当代实际。还要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注意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合,努力提高国民素质乃至军人战斗力等实际领域。无论是国文化、家文化、仕文化,都是中华民族集体心理与行为模式的历史积淀。因此,心理学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或缺的责任。与会专家结合管理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成果,就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就心理科学在推动我国文化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和展望。

本次会议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我国心理学界各方代表聚集一堂,特别是首次以我国心理学界三个一级学会名义召开研讨会。会议代表中有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秘书长,以及北京高校心理系和心理学院的教授。二是与会专家一致认识到,

心理科学服务于“文化建设”这一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性,共同倡导我国心理学界在服务国家和人民过程中加强彼此协作的迫切性,特别强调在一切研究和建言献策中坚持科学标准的重要性。

本次会议达到了几个预期效果,一是进行了充分的学术探讨。各位专家本着学术自由的精神,做了充分的阐述和探讨,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考。二是实现了政府和学者的对接。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领导高度重视机关文化生态建设,期待从心理学界获得启发,并与其进行有效互动;而心理学界一直以来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开展研究,并密切关注组织文化建设,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积累,也期待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研究工作。三是启动了联动意向,与会专家学者特别赞成三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一所(心理所)建立规范联动机制,面对重大社会问题共同研讨应对策略。四是凝练了阶段性目标。经过研讨和交流,初步明确了拟于今年五月份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办的“机关文化建设‘心’视角”北京论坛,希望借助论坛凝聚专家优势开展系统研究,并努力争取申请国家级课题,以便着力推动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的实际融合。

心理学界更将以此会议为起点,通过建立相应的交流联动机制,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形成有实际意义的成果,为发挥心理学科优势推动社会文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研讨会发言纪要

张建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在元旦刚过、春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举办一次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的论坛(或者称研讨会),请来各位专家,就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各抒己见。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研讨会,将来逐渐形成一个机制或者一个平台,以便使我国心理学界在面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时,能够相互交流、彼此沟通。这次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因为我国三个主要的国家一级学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一起主办了这

个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心理所向各位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今天上午傅小兰所长和李安林书记因为出席科学院工作会议,不能出席此次研讨会,让我也代表他们两位,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此次研讨会的时代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国家战略目标。这个目标一经提出,就会化成为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规划。

我们都知道,在当今世界竞争形势之下,硬实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事实表明,即使在中国的硬实力(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以后,我

们也看到我们在世界上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这跟我们的软实力和我们的文化影响力没有强大到和经济匹配的位置是有关联的。软实力的提升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这块,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中国实际上是没有样板或者模板可以去模仿的。那应该怎么办?只有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自己的文化创新之路,让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真正使中国成为强国的目标。

对于国内来说,既然国家制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会涉及到相关资源的配置问题未来的资源如何分配。我个人相信,或许这个问题在制定这样一个目标的时候,很难可设想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发现十七届六中全会之后,为了配合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精神,很多人把文化等同于文艺,各地在文艺演出方面投入很多。其实,我们都知道文化不等于文艺,文化的概念要宽泛得多。所以,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心理学家,应该发挥他们的建言献策的作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给我们心理学界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知道汶川地震以后,心理学界抓住了契机,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们的党和政府,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对心理学有一个刮目相看的机会,对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的契机如果我们能继续抓住,其实也是一个促进心理学本身发展的契机。

关于文化的含义,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人是生物人同社会人的结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适者才能生存,它强调的是无情的竞争。我曾经与动物所的专家座谈。我发现,对他们来讲,动物(包括人)非常简单,就是完成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繁衍的基本任务。但是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讲,其实人类的使命远远超出了生存繁衍的范畴。人们除生存竞争之外,还要更多的合作,怎么合作,有什么样的机制保证和促进他们的合作,从而达到种族的生存发展?其实这就涉及到了文化。所以,文化其实更多的是跟合作、及其制约和促进等因素相关联的非自然之物。文化研究对于人类的生存发展非常重要,且随着文明的进步,会越来越重要。对于文化学者来讲,他们常常把文化分成为客观文化和主观文化。客观文化更多的是有形的东西,如文艺表演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東西;但文化更多地带有一些主观内容,如信念、价

值观等。心理学家则更多地研究主观文化。

主观文化又分为多个层面。最里层的元素是我们人类的基本共识,英文叫做 assumption。之后依次有价值观、信念、行为、约束、引导等,以及在所有文化机制作用下,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一些后果。全部上述元素都可以归为主观文化。在特定研究语境下,上述元素可以被操作化为变量,他们就便成为心理学家所熟悉、所擅长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心理学家要解决、给予回答的现实问题。所以说在文化建设方面,心理学家能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化之中越往里层的元素,是越难改变的东西。我在这里暂且翻译成“共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最基础的东西,比如中庸、慈孝等,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但其中哪些内容对于我们的生存发展是有利的,哪些有制约的作用?都是我们应该加以研究的内容。

研究发现,人类的生存发展是有不同的发展路径的。第一种生存发展的路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它也不断在生长,并且呈现出与文化强弱的正相关关系。第二条生存发展的曲线显示,它的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劲儿就不足了。这也是与文化的影响有关系的。文化的开放性、创新性不足,导致群体和民族的生存危机。经济发达程度自然是生存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可能不是一个必要充分的条件。只有“经济”加上“文化”的共同繁荣,生存发展曲线才可以有一个持续性和上升趋势。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讲,中国的发展要强调可持续性,比如道德建设就是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所以,文化建设对于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之所以重要,从上述研究中就可以显现出来。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这样一个学术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心理学界能够逐渐形成一个习惯或者机制,大家经常保持交流和沟通,这本身也是学界的文化建设。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很多工作上,特别是在促使党和政府、以及老百姓加深认识心理学时,常因为我们内部之间沟通不到位,给社会传达出矛盾的信息,反而造成工作的被动。今天,我们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使得三个学会的领导和专家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也是我们举办研讨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然,我们也很高兴,中央国家机关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和科学院工会的领导也一起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使得我们有

一个跨界的沟通渠道,使得学术界的声音和学术界外部的需求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共同探讨文化建设的问题。

最后,我要提及一句广告词,“我们不能预测历史,但我们可以创造历史”。历史是我们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什么?文化不过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类历史的积淀。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聚会,其实已经在开始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已经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如果大家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我们或许会迸发出更多的新的想法,对于从心理学角度更好地提出我国文化建设的建言献策,是有所助益的。

我们研讨会的主题就是两个:一个是梳理一下心理科学跟文化建设过去的研究成果,挖掘它;一个是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大家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对我国未来的文化建设提出具体的建议。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文化是极富特色的,几千年一直绵延不断。许多文明都随着时间而中断,而中国文化则一直延续。心理学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特色文化的研究,比如集体主义、威权主义、家族主义、关系、面子、耻感、外控。它们在使我们的民族生存下来的过程中,有着积极、正面的作用,它们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我们的研究除了关注它们的消极方面,也要关注起积极面,这对于我们创立新的文化,增强我国的软实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应关注中央国家机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其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来领导。如果中央国家机关的文化建设搞好了,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积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

我利用主持人的身份,先开个头,也给大家拜个早年。谢谢大家!

杨玉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说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重视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同时,也把文化建设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我们的国力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这件事情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感到我们的文化有缺位,我们道德有些滑坡。这些东西也都会成为我们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提出加强文化建

设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

谈到文化建设,其实文化与心理之间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一定具有心理的基础,心理也一定具有社会和文化的基础,在心理学的研究体系中,其实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比如说我们有文化心理学、跨文化比较心理学,现在甚至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还要去找文化心理的神经基础,有文化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北大心理系开展这样的研究,比如在东西方的文化中关于自我,其实这个含义是不同的。东方人的自我不但包括自己,还包括自己的亲属,比如父母;而西方不是这样的,而且这种在我们大脑的功能中是有所反映的,这也是认知科学的发现,在国际上都是认可的。所以,心理学非常关注心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差异,同时也在寻求理解文化形成的心理学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因。这种研究我想大大地丰富拓展了我们对人类心理行为的理解,同时也沟通了生命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所以,这种研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同时也确实对整个科学体系都有重要的影响。心理学确实非常关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与心理相关的,我们在国内有四个学术组织,即心理学会、心理卫生协会、社会心理学会,还有一个人类工效学会,最后一个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关系不大。今天跟国家工委领导一起共同探讨心理科学和文化建设的主题又有特别的意义,这三个组织虽然都跟心理有关,但是大家平常关注的重点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采取联动机制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心理学会一直就有这样的主张,特别希望建立沟通和联络,更好地应对国家在建设和发展中,特别是与心理相关,在心理健康、国民素质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要达到共识。

机关是一种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的组成部分,政府运行好坏,效率高低,实际上是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状态都密切相关的,所以,他们在我们国家权力运行和社会建设中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国家机关作为一种组织,也需要有自己的文化,它的人员素质、人员的水平和状态也都和组织的文化密切相关,它的运行效率,人才的成长也是跟他所具有的文

化密切相关。心理学恰恰也是非常重视组织层次的研究,一个组织怎么样具有更好的效力,形成凝聚力,用什么样的机制激励员工工作的状态和他的发展,我觉得是有很多研究的。这实际上就是组织心理学研究的问题。这种研究成果我想对于我们国家机关的文化建设或者是对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都应该有重要的启示。当然,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组织,本身也应该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过去我们研究组织是因为组织心理学比较关注企业的组织,企业的文化,但是我觉得对于政府的组织,近年来这种研究也开始关注,而且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成果,我希望这些东西能成为我们沟通心理学与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我觉得在这样一种认识下,我们对今天的研讨会应该有很好的期待,我预期我们会取得很好的成果。第一点是我们这几个部门在一起探讨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问题,在解决与社会有关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应建立学术组织之间的联动机制,也是我一贯的一个想法。第二点,我们和这几个学会之间的相互沟通,以及我们与政府组织部门之间的沟通,一定会使我们的心理学工作者,也使我们政府部门机关的工作者都获得新的思考,使大家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都会获得新的理解,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答案。我想这是可以预期的。另外,心理学与国家机关工委联络其实已经建立了,已经有了这样的平台,我想通过今天的研讨会,一定会把这个工作推到一个新的水平。

赵国秋(杭州市疾控中心)

中央文化建设的决议出来后,作为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大家都需要非常深入地去思考文化背后的价值,价值的背后还有更高的像信仰等这一类的问题,在这之间心理学能做什么?中国的文化,包括组织文化以及官文化,心理学在行为、信念等方面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时,我们也看到机关效率的问题部分来自于心理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机关效率、人际关系障碍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觉得在这个层面,心理学是完全可以站在一个专业的角度,用自己的理论与技术去解决一些问题。从而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非常好地发挥我们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会一定会对大家以后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指导作用。

我非常同意在心理学的体系里,我们几家心理学的学会、协会应该积极地互相沟通,共同确

定一些大的主题,并且进行认真的论证,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更紧密的结合,我想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设,即和谐文化,大家在一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多次在常委会上讨论过这些问题,即在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上,我们国家级的心理学团体能够联合起来,并联络有关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我做了三十多年的精神科医生,很关注心理学跟文化的关系,以及心理学跟心理卫生问题的关系,关注多元文化的认同和信念的危机,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它所导致的心理冲突的增加,心理冲突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家知道刚解放的时候,老百姓都很幸福,而现在的老百姓都不幸福,不是一般的幸福,当官的不幸福,有钱的不幸福,不当官的不幸福,没有钱的也不幸福,原因非常复杂,从单元走向多元,但是这个过程中心理冲突是重要的基础。所以,两亿多的中国人急需心理学的帮助,在这样的过程中,心理学文化建设跟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2008年,卫生部指派我去了胶济铁路的事故现场,这次“7·23”也是政府指派,也是我带队去的,我的感觉非常明显,两个铁路火车事故,我觉得这一次的抱怨和愤怒情绪明显的比2008年的要多。实际上2008年的胶济铁路事故死亡的人数和受伤的人数是这次“7·23”的倍数,但是这次处理的难度很大。2008年,卫生部派我们去,三十多个人工作了八天,很顺利地撤回来了,这次“7.23”事故我们整整在那里工作了14天,到撤回来的时候,我觉得还有很多问题。后来温家宝总理也去了。这里面我思考什么呢?幸福指数如果越来越低的话,一个人的抱怨情绪可能会越来越高,他愤怒的指数可能越来越高。所以,和谐社会,我想心理如果不和谐,什么都不可能和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推理下,我觉得有必要要去考虑一些文化建设过程,最高层面应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心无旁骛才能淡定人生,如果信仰缺乏,社会和谐、诚信乃至感恩都将会充满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佛教崇尚的应该是和谐,应该是诚信,我亲自问过和尚,我说“和尚”两个字怎么解释?他告诉我说和尚即尚和也,我觉得他解释得非常好。一个民族不能没有信仰,哪怕是几千年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也应该肯定佛教的文化,把它作为一种建

设也好,推动也好,我觉得不应该忌讳,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点事情。这是我谈的一个想法。

官文化也好,仕文化也好,我们最近对近2000名公务员做了一个调查,确实不乐观,跟最近公布的中国在155个国家中的幸福指数位列125位是惊人的相似,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很低。我们仔细分析了公务员的幸福指数,压力来源,应对方式等。他们的幸福指数不高,我想如果他们不幸福,通过投射,权力影响等,恐怕后羿的合并问题会更多。所以,老百姓的幸福问题首先要考虑公务员的心理健康,促进心理压力调适,心理疾病防治和心理疾病的干预,我觉得这一块要提到一定的高度上来认识。

车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关于文化建设,以前常考虑,但没有专门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讲组织文化、企业文化,常提到文化的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价值观、理念,即做事情时人们内心秉承的重要原则,关于是非、对错等最基本的东西。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导下,就有了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叫做行为规范,关乎怎么做人做事,包括从最严肃的党纪国法,一直到民俗、道德规范等。如我们今天开会,应该怎么来开会,话要怎么讲,这跟在家里吃饭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层次跟物质有关,今天会议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喝水杯子,开会办公地点如何布置等,都可以说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现在党中央提出文化建设的工作任务,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化非常乱。乱在哪儿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但是又不同于儒家,还包括其他各家的思想。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冲击了两次,第一次是“五·四”,打倒孔老二;第二次是文革,传统文化彻底被否定了。从鲁迅以及很多新文化运动的先哲们的文章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对旧文化的深恶痛绝,认为它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落后都是它造成的。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更是厉害。

这两次毁灭性的经历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套,依然存有传统的文化。我们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推行了一套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学雷锋的文化,有道德和行为的规范,以及政治思想、理念等内容,这是第二套,即所谓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第三套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

传来的东西。有人认为儒家传统文化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看凤凰卫视报道,世界上最有贡献的十位华人,感言里有三四个人都说我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优势或者别人不能取代的长处。而社会主义价值观人们也仍在提倡。同时还有很多人认为,西方的东西,包括人权、个人主义,自我实现等也是好的。但是两者或者三者文化之间有时候会打架,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当前主要还是竞争关系。我从二十多岁学生身上就发现问题。孔融让梨是我们从小就学的故事(这是传统文化),但是要是十个人抓阄我得第一,我当然拿大的,为什么要拿小的(这是西方文化)?所以有时它们是打架的。这样的情景下,人们就失去了行为最重要的理念基础,不知道该怎么行为,是人重要?还是钱重要?是道德重要?还是利益重要?我们说见利忘义是大家很深恶痛绝的,但是现实确实是利益优先。所以中国文化的现状还是很混乱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重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存有虚伪的成份。以贾母为代表,她认为,“林黛玉若要还有什么想法的话,就是白疼她了”(应该守身如玉),而男人(宝玉)偷女人属于“哪个猫不吃腥”。可见,有两套行为标准,对一些人一套,对另一些人是另一套。让女人讲贞洁,而男人则可以三宫六院;他让别人遵守规则,自己却不遵守。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混杂的儒家传统,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西方的文化影响。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重建文化要完成的一个任务。

第二,心理学跟文化建设有什么关系?人要解决的问题有三层:第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环保或者尊重自然规律,中国讲究天人合一,人要跟自然和谐。第二个层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问题。第三,人和自己的关系,即自己怎么看待自己,怎么对待自己,怎么管理自己。我觉得,文化建设跟我们心理学关系密切得很。首先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有环境心理学等。人和人的关系,如何协调人际关系,我们社会心理学有一系列的研究,而且对指导人的行为有很好的作用。人和自己的关系,自我、自信、自我效能感等都是心理学的概念。现在的年轻人或者社会上有很多混乱,其实是在以上这些关系上存在混乱。我

觉得,我们心理学能做出一些独特的贡献。

第三点,今天我们的座谈会,有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社会心理协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领导参与。这个座谈会座谈结束了又如何?我希望,有关机构领导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能够发挥学界的力量和我们机关工委的力量,进一步推进有关的研究、并落实一些后续的活动。

丛中(北京大学医学部)

我是个精神科医生,想从微观的角度来谈一下社会文化建设这一宏观的问题。

一是弱势人群的问题。正在制定的《精神卫生法》可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总的来讲,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各种精神障碍、失眠症、抑郁症等,这与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等所有弱势人群都有关联。这些心理健康问题是将来我们要去解决的。

再者,少数人的问题。少数人和弱势人群是相关的,但不能等同。领导干部是少数人,但是他是强势人群。弱势人群里的病人是少数人。我作为精神科医生,想着将来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再修订的时候,是否能不再将同性恋的性取向放到诊断标准里。文化进步使我们要把它消灭掉,性取向不要再列在诊断标准里,这就是少数人的问题。我们在咨询时,经常说要尊重来访者,中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常以多数人的利益为依托,却漏掉了少数人,特别是那些弱势人群的少数人。他们的利益由谁来代表,由谁来关心,这是个很大的政治问题。有调查说,2%的人群是同性恋,那么全国就有2600万。这部分人没有人代表他们说话,这是有些问题的。我是拿这个群体作为关注少数人的例子。

以人为本,“为了最大多数人利益”,我觉得应该改成西方的观点,叫“为了每个人”,每个人和多数人是同等重要的。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牺牲少数人的利益,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好像少数人不是人,他在法律上失去了平等主体的地位,这是将来文化建设的一个视角。

第三点,政府和管理老百姓,应用心理学的原理时,类似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要给来访者留足自由自主空间,接纳关注,这个跟以人为本是一致的。别太强硬地要“消灭”一些文化现象或者一些东西。比如说,先进文化就是优秀的,就

意味着,落后文化就应该被消灭。文化就算有优劣,但是也不应该以优劣来论,更不能以文化来论民族和个体。在尊重每个人的时候,我想应尊重差异性,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亚文化的差异性、种族之间的差异性。我们以法制为基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文化面前我们如果能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将双百方针用在文化里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第四点,不要去定义一个人,而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引导。少去说某某人是农民,某某人是富二代。管他是富二代、官二代,还是穷二代,开车撞人都是违法行为。要以行为来论,在中国文化里我们过去承载了太多家族的东西。

此外,还要警惕宗教文化的政治企图。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有人问传教士传教有什么好处?传教士说,传教之前,你手里有土地,我手里有圣经,传教之后你手里有圣经,我手里有土地。我们过去的一个传统说法“宗教是精神鸦片”,这些年一方面是尊重信仰的自由,但是文化建设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小心,我们党在文化建设不到位的时候,宗教就可能钻空子,如果宗教背后有政治势力做背景就会很危险,这是要警惕的。

再有就是由于性别比例失衡,将来的恋爱、婚姻可能是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过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将来个体可能会作为存在的单位,而没有家庭。将来有可能婚姻法没废除,但是大家都不结婚,它悬在那儿没用了。据说美国离婚的人数达51%以上,国家制定的法案都会有利于非婚状态的人,中国会不会走这一步。所以,在婚姻价值观方面,过去女人主要照顾孩子要讲温柔,男人出去扛石头要坚强,现在照顾孩子的时间少了,女人要在社会上工作,所以,男女劳动方式造成的性别角色的差异正在变化。所以,将来我们在培养下一代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人性化,男人、女人越来越强调是人,男女的差异性会不断消失,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一些工作。

最后,我非常赞成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要让好的更好,而不仅仅是预防疾病。

樊富珉(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将心理学和国家文化建设,大政方针、国策结合起来讨论,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记得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出台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文件,心理学界积极响应,做了很多的思考,探讨我们心理学可以为和谐社会建设做些什么。事实

上,从十六届六中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和谐社会建设方面,心理学界已经出了很多成果,比如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指标的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危机干预与管理等。今天这个会的题目是心理科学与文化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但是我相信这个会将对心理学的发展和心理学对国家的贡献有积极的意义。

我个人觉得,文化的问题大到世界,小到个人的行为,无论怎样,文化的传承也好,文化的创造也好,都离不开人,只要有人,心理学就有用武之地。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是全国心理学系中最年轻的,才复建三年,还处在初创阶段,但是建系伊始,为了突出清华的特色,就把文化和社会心理学作为我们学科建设四大主要方向之一。我们系主任是做文化心理研究的,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方向上更加加强研究的力量。比如我们现在的一些博士生,博士后在做美德心理研究,探讨美德到底有没有,美德到底是什么,美德的结构是什么,美德怎么去培养。我们也有学生在做辩证思维、辩证情绪的研究,我们心理学系会把文化心理作为一个重点的方向来继续建设。

另外,从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来讲,主要偏重心理健康教育、临床和咨询心理学方向,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很多事情。当吴老师谈到和谐,和谐文化,突然就让我想到民族之间也好,群体之间也好,甚至个人之间的冲突,很多东西是一个文化上的,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思维方式上的不一样。我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专家的跨文化研究,他是犹太人,曾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里逃生,幸存后的所有工作都集中在致力于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后来,他创造了一种社会团体辅导的方法,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人集中在一起,二十多个人,通过共处和团体交流消除偏见和歧视,在合作过程中增加理解,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后来日本的心理学家把这种方法借鉴到日本,来研究中国和日本青年之间的民族偏见和对立,因为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讲,中日两国青年还是有很多因为误解导致的不和谐,冲突。所以,日本心理学家和中国的学者一起合作,做了这样的研究,在南京应用团体辅导、心理剧、参观访问等多种干预方式,让两国青年20多人在一起

探讨、交流、分享、活动、合作,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化解了一些民族间的误解、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当然实验是小规模的,但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我原来研究的基本上是小团体,针对心理健康和自我成长。怎么运用大团体的观点研究民族和文化的融合,这种探索给了我启发,我相信这种研究的成果对不同民族,对不同阶层,对于不同的团体的和谐相处都是有意义的。

今天还有国家机关的相关部门领导同志来参加,心理学界为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刚才大家谈到官场文化,全国96个部委十几万人的公务员队伍,怎样应对工作压力、怎样处理特殊文化圈子的行为、怎样维护心理健康,都是现实的问题。现在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的服务中有EAP,即员工帮助计划,一般而言EAP服务主要在企业开展,对于政府机关和对公务员来讲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东西需要探讨。我记得几年前北师大的石林教授做过一个研究,研究了三个群体,教师、公务员和企业家的压力,最后的结果是公务员压力最小的,企业家压力最大的,教师其次。但是这些年国情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声音也在媒体上常常出现,因为要求高,任务重。如果是一个廉政的人,他的待遇也不是那么高,这样的岗位上又肩负着很重要的责任。怎么来促进他们的心理和谐,应该和企业的心理服务有区别。所以,可否创造MAP这样新的概念,也就是管理者援助计划。我建议在为公务员提供心理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公务员的心理建设和心理健康维护,激发公务员正向积极的心态,感受快乐工作和幸福生活,在心理服务方面针对不同的群体和对象有新的想法和创新点。

方平(首都师范大学)

文化有大有小,从大的方面来讲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从小的方面讲,中国文化有国家层面的,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各个地域之间的文化,还有组织文化。所以,从横向来讲,我们要研究文化的大方面,我曾经和美国一个教授做过交流,因为我原来在师范大学研究教育心理学,美国教授就问我,你们的教育心理学都有些什么样的理论?我只能列举国内目前在教育方面做的

研究的理论基础,把美国一些教授的理论陈述一遍,美国教授还有一个中学的教学方法上的变革,比如我们强调个性发展。我话还没有说完,美国教授就打断我,说你不要跟我谈这个,我们美国之所以在教育整个研究领域出现这么多问题,跟我们文化自身的缺陷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们为了弥补文化在教育上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的文化中去寻找弥补我们文化自身的缺陷。找到哪儿了?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所以,我们把集体主义思想引入到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过程中,也就是他们更多谈到的团队精神,实际上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精髓之一。

我首次感受到比较震惊的是,我们国内很多的教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基本上来源于西方文化沃土下产生的理论,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一直谈到比如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其实所谓本土化问题,中国文化的沃土下失效主要是土壤不一样。这点从测量学角度我们也深有感触,曾经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同一个品种的金鱼,如果放在福建养和放在北京养,它的尾巴的长度会发生变异。就跟我们说北方的黄芪和南方的黄芪药性不一样一个道理。作为文化来讲,西方文化产生的理论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的的确是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要考虑的问题。从测量来讲,我们一直强调测量工具要在国内进行修订,已经不是完全的修订,是根据本土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积淀或者沃土上,设置我们测量的相应方法。技术和方法可以用西方的,但是作为文化根基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方文化跟美国第一次撞击,对我的震惊比较大。所以,我总是在想心理学应该怎么去更适应我们社会的文化。

第二,关于文化建设,文革时期是第二次对文化的冲击,对我们国家传统文化的否定,我想可能我在这时候接受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是至少我们这一代还知道我们在这上面的缺陷,所以,在这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功课以弥补文化上的缺失。现在学校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但是在文化建设中确实有一定的缺失。所以,在学生里也流传着“有知识,没文化”。确实在现实中也反映出一定的问题。所以,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而且强调文化的作用,我觉得还是非常及时的。这些文化应该是国家民族延伸

的一个重要载体。重视和提倡文化建设也是社会主义大发展的一个关键。所以,现在强调文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文化的发展应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文化的传承有一个变化过程,这跟经济基础有紧密的关系,缺乏这样的经济基础,文化的建构实际上困难的。比如现在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可能跟这两个认识有关系。从党史或者哲学这方面来看,我们国家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的,从建国到现在,我们国家还谈不上完全工业化,因为我们国家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型到工业化,虽然现在我们已基本进入工业化,但西方已经是后工业化阶段。所以经济基础不一样,对人的意识的影响也不一样。

第四,我们怎么汲取文化中的精髓或者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我们怎么做这样的工作,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我们不能准确地识别我们文化当中的精髓或者是人类的优秀的文化遗产,那我们在发扬文化传统的时候可能连糟粕一块儿发扬。有些春晚节目,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在弘扬我们国家的文化精髓,而反倒是一些糟粕。我个人觉得心理学工作者如果能从这里介入,去分析去挖掘,那我觉得对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应该能够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鉴赏力。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有很多西方的糟粕被引入了,我觉得跟我们自身对文化的鉴赏能力是息息相关的。没有一个好的文化鉴赏能力,我们很难去识别其他文化的糟粕或者精华。所以,我觉得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第五,建议心理学的整体研究,应该从整体导向上鼓励更多的人群从事关于心理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研究。但是从目前来讲,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没有处在一种平衡状态。我个人觉得中庸的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体系下还是比较适当的,中庸的内涵,我觉得是一种阴阳五行的平衡。我看过一本中医的杂志,谈到中医的“中”字意思,中医的“中”不是我们理解的中国的意思想,“中”字是中庸的意思,非常符合阴阳五行平衡的思想。现在我们谈到和谐,和谐的本质就是一个平衡。所以,这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积淀。

从思维的角度,心理学可以做一些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连续性、变化性、矛盾性和西方的

思维方式不一样,这也是这样一种文化产生的特定的思维方法。所以,这方面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第六,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我是研究情绪的,特别是情绪调节,我发现很多的研究现在也非常强调文化在情绪调节中的作用,不同的文化模式,实际上对情绪调节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比较典型的,大家都知道的羞愧,东方人可能羞愧感就比较重,西方人相对来讲就比较弱。所以,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

韩布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有人提到中国文化里有很多虚伪的东西,我深有同感,虚伪其实是所有文化的共同性,说的跟做的绝不能完全一样。言行不一全世界都一样,东西方文化里都有虚伪的成分在,怎么办呢?前年开始,我们讨论精神卫生法的时候,就提出应该针对绝大多数的国民搞心理健康促进法。我在想,心理健康促进到底怎么促进,新时期心理学家对中国国家的建设,如何起到智囊作用?对我们学会,科协要求给国家分忧,怎么去做?

第一个问题就是心理健康,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心理健康是相对的,对于强势群体,信则有,不信则无;对于弱势群体就是信则无,不信则有。这个强势、弱势可以是官府和民众,也可以是上级和下级,也可以是师和生,也可以是父母长辈和晚辈,因为每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人,他在社会里具有社会责任,有工作的,有家庭的,有义务的,也有对他的个人福祉的诉求,在完成社会责任的同时,他也有期望。期望和现实差距越大,心理冲突就越大,可能就表现为不能适应、非常态的言语和行为或者失衡。怎么办?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文化建设里我们要尽量减少这个虚伪,所谓宁交真小人,勿语伪君子。

中国的文化,有做事的(以正合以奇胜、行大事不拘小节、中庸),有做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义廉耻勇,和谐、厚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其相对的积极或消极性端视具体的人、地、时、事才能确定。这些核心文化价值观,因出身、年龄、教育背景不同,在现职干部中秉承的程度各有不同。改革开放30年,西方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自我实现、追求自由、个人主义)。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与价值观混合,导致干部们在工作

面临很多的心理冲突(或者叫不一致),比如角色冲突、期望(职位、报酬、情感鼓励等)和现实冲突、所受到的教育(台面上的东西)跟工作现实(台面下的东西)不一致等,这种失衡他接受不了,怎么办?我觉得现代心理学的主要研究与服务对象是人,具体到咱们今天的议题就是现职干部。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干部文化建设怎么去平衡,怎么在制度化、技术化,从心理学的角度为国家发展服务,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对于人的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比西方现代心理学高明得多。比如官文化和民文化,官文化,你不信就是厚黑,信就是包青天;民文化,你不信就是刁民,信就是顺民。怎么办?我觉得中间还有种仕文化,值得我们注意。

数千年来,学而优则仕,大部分士大夫的自我社会定位是家国一体、情感上因儒仕道多重影响倾向于“自给自足”,在做事时的应付与无愧天地,做人时的无愧与圆滑之间走钢丝。这是与官本位的施政实务有许多根本性的矛盾。认识不到这一点,生存都有困难,更谈不上实现理想与抱负。毕竟,明君、青天的数量是有限的。曾国藩家书之所以受欢迎,因为他对这方面有许多的思考和践行,从困扰中走出来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范仲淹作为宋时从基层芝麻官到朝堂大员、四上四下的干部,亦是仕文化的代表。他既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时还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忧和乐的情绪他是怎么处理的?他有无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带来的心理失衡?他在忧民的同时,是否忧官?心理学可以好好地研究他。这对于现代干部文化建设,怎么去平衡忧民与忧官(职与位)、乐民与乐官,如何针对现代干部的“四座大山:怕丢位子、怕得罪‘上面人’、承受不起金钱与美女的诱惑、愧对家庭”开展工作,如何在青少年教育中引入相关社会适应教育,都很有启发。

刘力(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心理学内涵,也为心理科学参与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在“决议”中关于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中有一个重要的表述: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界。我想就此谈几点感想。

第一,关于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大家已经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我不再重复。我只想补充一点:文化与心理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百多年前,科学心理学创始人冯特已经明确意识到心理学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个体心理机能的研究。因此,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冯特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并在1900~1920年间出版了10卷本的Völkerpsychologie,此书名本意是“历史与比较的社会文化心理学”。在这套丛书中,冯特以语言、神话、习俗、艺术、宗教、道德和法律等为切入点,探讨了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机制,为心理学与文化的关系奠定了学理基础。纵观近一百年来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可以发现,以本国文化为根基、以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导向,是社会心理学的生命力源泉,也奠定了该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特色。无疑,心理现象与文化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文化心理学已经逐渐地成为一门显学,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第二,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我们必须重视民族心理的研究,进而加深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起源于东西方冷战时期的跨文化心理学,往往从西方文化沙文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以白人作为“标杆”来研究东西文化的文化心理差异。例如,尽管Geert Hofstede教授提出的跨文化差异的5个维度(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化与女性化以及长期与短期取向)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是,它却反映了研究者的文化偏见。我国台湾本土心理学家从文化本位视角出发,采用关系、面子、孝道和中庸等心理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这类研究理念未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变迁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因此,到底什么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有待探讨的科学问题。通过探讨民族心理来揭示中国民族文化的本质与特征,是时代实赋予中国心理学家的重大历史使命。

第三,我国的社会转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资本与商品的越境流动,更重要的是自我概念、社会认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的跨文化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个体内部、

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际关系以及组织和宏观社会层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大家刚才谈到了心理健康、价值观冲突和危机干预等,都非常值得心理学家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目前,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学团队正在从文化心理学视角,研究民族关系、腐败成因、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职业心理健康等课题,希望能基于全球化背景对理解和解决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贡献微薄之力。

最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985工程、211工程、知识创新工程以及863计划和973计划,对于解决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今天,由科学院心理所联合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举办这个研讨会非常具有前瞻性。如果我們能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向国家提出“发挥心理科学优势,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议,进而启动相应的战略性计划,那么,心理科学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别于经济和科技的新动力。

罗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目前,文化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有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提到文化就是人文的教化。所谓人文,就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痕迹,这些痕迹当中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心理的,也有习俗的;包括意识和潜意识范畴内的各种东西都是这种称为“文”的痕迹。什么是教化呢?打个比方,现代枪械的子弹之所以能打得很准,是因为枪膛里面有来福线。没有来福线的枪,子弹飞出去不久就会翻滚,难于控制方向的准确性;但是有了来福线以后,子弹就高速旋转着前进,能够打得很准。这就是枪膛里的“文”对子弹的教化,子弹因此而变得威力巨大。

如果没有经过任何人文的教化,那么人就是一个完全中性的存在,没有任何特别的作用。我们所有的文化,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物质的,其作用都是让新的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一定的塑造,把他引导到某个方向。所以,从这点来讲,文化就是我们人文的教化。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说文化建设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引导人民、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

有人说,文化是不能建设的。这不能建设的

是人本身,或者说人的潜力;因为每个人的潜力都是完整的、没有缺陷的,所以也就无从建设、无需建设。但我们可以去建设枪膛中的来福线,保证子弹打出去的时候具有足够的准确性,这是我们可以建设的部分,是文化。

举一个历史的实例,可以说明文化内涵中建设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中国从汉、唐一直到宋代,文化与经济都日益繁荣,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即“中央之国”,包括了世界经济和文化双重的中心,给全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很开放,思想很解放,经济很发达,科技很先进,人民的素质很高,各行各业中创造性的人才层出不穷,文化整体蒸蒸日上。那个时代的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人。

但是,后来为什么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呢?在宋代晚期,中国不幸遭遇了世界上空前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历史上,埃及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都先后被野蛮民族消灭了。面对席卷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以文立国的大宋也无法抗拒。但幸而有宋代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代表人物先后影响了蒙古上层,使蒙古帝国在入主中华时,收敛了在欧洲和中亚惯用的杀戮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文化,经由蒙古帝国时代的西方传教士引入欧洲,带来了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终结和文艺复兴的启蒙。

进入明代,朱元璋重用朱熹的学说和思想来阐释中国文化,以行政命令强制规范全国的学术思想,导致中国文化全面进入了朱熹式的封闭、保守时代。这是对中国文化的第二次沉重打击。整个明代,中国文化从开放日益走向封闭,从创新日益走向保守,导致人民素质下降、文化学术僵化、科技停滞不前、政治和经济实力日益下降,这和明朝政府强制限定文化内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日本民族认为,宋代以前,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宋亡之后,世界上就不再有“中国”人。

在明末的混乱局面中,满清趁机入主中原。为了防止再度出现蒙古帝国在短短八十年时间内覆亡的覆辙,满清政府对中国人民采取了奴役式的洗脑教育。因此,中国文化在明末时期封闭保守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了奴隶性、顺从性,变成纯粹以顺应统治者意志为核心,丧失了文化中所有的开放性、创造性、进取心、正义感和责任心。

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荡然无存。这也是清代从大清帝国中叶康乾盛世在短短数十年间沦为世界列强欺侮的对象、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五四以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本土文化沦丧、思想全盘西化倾向的潜台词。

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文化是大有所为的。文化不仅可以建设,而且这个建设的优劣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关系到国家的兴亡。选取了正确的文化道路,国家民族就兴旺发达,足以为天下之典范;选择了错误的文化道路,国家民族就衰微混乱,成为世界上文明丧失的牺牲品。

那么,我们的文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文化的精神。不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文,这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文把它自己的成员化成不同的状态。像西方的文明就比较强调个体,把它的成员化成个人主义的状态。当然,现在他们觉得这个不够好,因此到东方传统的古文明中寻找一些可以使他们更具备集体精神的东西。如同他们在中世纪曾经做过并且大获成功的那样。刚才说到有研究表明,北大的学生其实挺个人主义的。这个结果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北大一开始建校就讲自由、民主、科学,也就是比较纯粹的西方文化;所以,它的学生不管以前是什么主义,在里面呆上几年都会变得有点个人主义,这是肯定的。我们将来具体把中国人化成什么样子,就取决于我们现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我们把这个纹刻好了之后,未来的人民就可以向这个方向去化。虽然人可能有先天的因素,不可能化得完全一样;但是总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塑造,使我们民族的平均素质更向某个方向发展一些。

因此,在这个角度上说,文化建设大有可为,而且心理学界在文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心理学家了解人的内心,了解怎样的建设会给文化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些从历史到社会现实,从行为到深层心理的研究,会对文化的方向提出很中肯的建设性意见。

钱铭怡(北京大学心理系)

我们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会接触到更多的问题行为,2009年费立鹏教授在《柳叶刀》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国四省六万多人抽样调查显示,一个月内存任一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17.5%,17%以上意味着涉及到全国上亿人,这么多

人可能都需要精神病科专业人员的帮助和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的帮助,这样大的人口存在心理问题,这些方面我们心理学都可以做工作。

我们一直在想社会及文化变迁对这些精神障碍的发生有什么影响,未来要研究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变革时期出现了心理问题的变化。有老师把心理问题归类,发现重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变化从1982年到2005年没多大变化,变化的主要是情感性精神障碍和焦虑障碍等。这些都是人心理上对社会适应存在问题的反映,情感性精神疾病现在增加最多的还是抑郁症,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同时要做出适应性反应的方面。

此外,文化的变迁也要求我们不仅仅等到人有病了再去做心理干预和治疗,更多的要做预防性的工作。所以,对文化和心理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出适应性的反应,未来希望政府部门和有关领导在政策和科研项目的引导上,也能够有一些适应性的反应。

现在我们谈的文化还是比较偏重于现实。像现在搞一个春节晚会,一掷千金,各个电视台都在搞,但是对于历史的重视不够。崔永元的口述史却难以播出。我和一些同行现在也在开始做心理治疗的历史访谈。我一边访问着刘协和老先生,我一边在想,他们知道的那些东西,未来再不想办法留下来,可能我们就后悔莫及了。心理学的历史也没有受到重视,我希望心理学会也能领导这方面工作。我们参加心理治疗历史研究的所有成员都没有任何报酬,如果我们去访问老先生,我们会利用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出差去做,如果给老先生买一些礼品,我们自己掏钱,包括请人去转录,因为没有项目的经费支持。这样的项目我曾经想到哪儿去申请钱,感觉没有。除了心理治疗的历史,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都应该做出研究来。老先生们将来走了,我们就找不到了,因为有很多人亲身经历的东西文献里是没有反映的。所以,这些方面希望国家能够重视,希望学界能够重视。

另外,前些时参加了正念(mindfulness)工作坊,正念是美国的卡巴金(Kabat-Zinn)教授等结合中国佛家的思想,运用到心理治疗的领域创立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他实际上后来做的更多的是在员工的减压和放松的领域。他把中国的东西拿去运用得很好,我们是不是也要下决心做一些工

作和努力,把中国的传统思想更好地在我们的心理学里传承和运用。

孙健敏(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很多学科都在研究,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等。但究竟如何定义文化,如何解释文化,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大家说中国是集体主义的文化吗?概念上是这样讲的,但生活中未必如此。美国人说公共场合我们最不讲集体主义,反倒是自己顾自己,比美国人还个人主义。当然这涉及到如何定义集体主义,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垂直和水平集体主义的区分,甚至用心理集体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个体行为。但我比较赞同黄光国先生提出的关系主义,中国人不是集体主义。关系主义可能也不够,我把它叫做圈子主义,我们讲团结同志都是组织内部的,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这个民族的东西,但文化是通过个体行为来体现和传承的。是一个入血脉中已经成为习惯的东西。北大的冯友兰说过文化就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说的是从人的角度,包括人创造的物质的东西。所以,谈文化一定要谈关于人本身的定义,中国是没有人的,中国只有仁义的仁,即仁者,人也。整个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上,只有通过关系才能定义一个个体。因此,计划体制下不结婚就不是独立的“人”,只能拥有集体户口,不能拥有独立的户口,因为不独立,所以不能分房子。我们定义人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最常用的就是他人,与他人的关系;也可以是身份,处长或科长,教授或讲师。当我们不知道你的头衔时我们是没办法跟你交往的。所以,大家才会谈到吃饭座位,发言顺序,称呼头衔等等,这都是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恰恰是本华的形塑。文化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比如中国为什么会有等级,是因为我们提倡尊老爱幼,这个提法没有错。但这个提法背后的思想有错,错在人是分老幼的,长幼有序,尊贵有别。为什么我们解决不了人人平等的问题?因为我们尊老爱幼,老的要尊,小的要爱,发言也有先后顺序。如果爱老、尊小,那就颠倒了,乱套了。于是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社会。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尊幼爱老”中国就有希望了。

文化发展,文化繁荣,繁荣什么?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糟粕的东西。比如酒文化,

地域文化,圈子文化,官本位,权力至上,等等。梁漱溟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明确提出东方化与西方化的问题,提出东方化能否存在的疑问(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我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很受启发,中国人是没有精神生活的,中国传统上把精神生活物质化了,比如父母关心孩子从来不问孩子开心吗?关心的做法就是让你多吃饭,一个“吃”字可以解释很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吃的开,吃不开,吃不了兜着走,吃香,吃亏,干什么吃的”,实际上这些词说的都是精神生活的东西,包括以身相许、身体力行、身不由己等等,其实是感情。是精神。

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心理科学和文化是什么关系。经济学家谈文化,谈文化核心的东西,就是价值,有关研究已经证明价值观跟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欧洲学者特洛朋纳斯写过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七种文化,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差异,从7个维度来分析民族文化。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文化。到目前为止解释最充分的还是心理学家。罗伯特组织的关于全球领导的研究,他们都是从民族的角度谈文化的问题,核心的东西都是心理的东西。我最喜欢的是霍夫斯泰德的定义,他说文化是一个心理程序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被程序化了,于是就成了文化的产物。这是从民族的角度,从组织的角度谈组织文化也是一个道理,我自己在企业做咨询和培训有很多感受,我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一个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所以,文化是不能去建设的,它是一个积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但是文化可以改造。

心理学可以做什么呢?最终解释的就是一个核心价值观。文化和心理学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可能文化核心的东西最终是需要心理学才能解释得清楚,只有把文化是什么解释清楚了,我们去发展也好,去繁荣也好,光大也好,才有可能,否则可能还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现象东西。我认为心理学可以通过四个方面的研究对文化发展和繁荣做一些贡献。

第一,核心价值观。心理学是一个实证科学,中华民族的科学不发达,但是我们的伦理很发达。所以,今天中国社会大家谈“应该怎么样”谈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基本上没有说清

楚。我觉得心理学可以做一点点贡献,即实质上是怎么样的,不作价值判断。不管中华民族的传统还是现在,核心价值观究竟是什么,现实生活中人们关于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人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另外,关于心态研究。大家都觉得中国人的心态非常浮躁,包括社会的,工作的,生活的,乃至于家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说不清楚。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宜音他们已经做了一些大范围的调查,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机会我们可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报告。

第三,文化与变态人格的关系。中国文化所造就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奴性的人,是一个权威人格,媚上欺下。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去见校长的时候,走到他办公室门口腿就发抖,嗓子就发紧,每次都要给自己打打气,其实领导也没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说明骨子里是惧上的,但是好在大多数人不惧下,是亲民的。健康人格的培养应该成为我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政府可以出面给我们更多的资助来把这个规模扩大。

第四个可做的,最近我们也在做,国内很多机构也都在做,包括心理学界的人,就是关于幸福感和心理压力的研究。最近我们调查了12,000个在职人员,得到了一点点有意思的结论。我们用澳洲的PWI,我们也翻译成幸福指数,做了一个调查以后,12,000人的规模比较了一下,因为这个PWI全球都在用,做下来,在全球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新西兰、西班牙、罗马尼亚、阿根廷都比中国高,墨西哥比我们高出三分之一,它平均分77.4分,我们是58.2分,这提示我们中国人关于幸福感和尊严的获取,还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最后一点,这样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前面也有人发言谈到了,我觉得中国心理学界相对来说个别作战的能力都非常强,但是整合得不够,要想在国内得到政府的重视关注,可能需要联合全国的力量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武国城(中国航空医学研究所)

从军队心理学工作者的角度,我很同意人们提到文化建设主要表现在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物质文化设置三个方面的说法,同时认为前两个方

面更为重要。我军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现在倡导的“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军队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的教育是主流价值观的灌输教育,一直在抓这件事情。行为规范更不用说了,因为我军有三大条令,一举一动要按照规矩来。

当前我军文化建设的新情况,就是特别强调心理学的作用,各级领导都希望心理学能为我们军队文化建设以及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座的很多专家多次被邀请到部队指导心理服务工作,举办心理知识讲座,就反映出这样一种需求。现代战争对参战官兵的心理素质提出很高要求,同时我军在执行抗震救灾、维和维稳、奥运安保、世博会安保、亚丁湾护航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官兵普遍承受较大的任务压力。现在从官兵成分上看,独生子女占的比例较大,学历层次较前提高,部队的管理却沿用传统的方法,青年官兵的内心矛盾冲突就表现得比以往明显。

现代战争仍然十分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作用,因为武器装备再先进,如果人的素质不行就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现在特别强调作战士气即战斗精神,也就必然强调军队文化建设,其中就包括和谐的心理氛围建设。我军现役心理工作者主要在两大层面开展工作,一是技术层面,比如研究开发招收飞行员、航天员的心理选拔方法、技术和相应的设备等。二是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上,帮助上级机关制定心理工作机制,2009年四总部下发的文件,要求军队心理服务工作完成八项任务,其中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测试评估、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咨询疏导、心理诊断治疗、心理危机干预、重大任务心理保障和战时心理防护,内容非常全面,正在全军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请各位专家继续并且更加关注部队的心理服务工作。一是有这样的形势要求,二是我们以西方心理学为主流的心理科学和现有的军队文化怎么去对接,这里就面临很多现实问题的挑战。

许燕(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文化需要建设。心理学科在文化建设当中的贡献在哪里?这是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社会责任与学科使命的问题。思考这一问题要从文化

自身的特征与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出发。从文化的核心层面来说涉及的是价值观问题,从文化的形态上说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需要设计与传扬。文化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同时还有一些超时代特征,文化融合了许多元素。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地区文化、校园文化等都是历史传统与时代特征的结合。一个学科也有它自身的文化,心理科学的文化特征体现在其实证性、渗透性、精神性等上,它确定了心理学的价值所在。心理学虽然探究的是脑和人的内在活动规律,但是以实验性研究作为其主要探究手段,更注重用客观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主观现象。由于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学科,哪里有人哪里就会有心理学,这就使得心理学可以渗透到很多学科领域,让心理学伸展出许多分支,如广告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网络心理学等等,这一特征也将心理学的应用更加广泛。心理学要解答人类的许多精神层面的现象,因此价值观、心理和谐、压力应对等社会心理问题都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心理学为人类提升生活质量服务的领域。

2.文化具有价值引导作用。良好的文化要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例如“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就是对首都文化的概括,它同时也是对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具有引导作用。文化的影响力有时也会表现出润物细无声的特点。这表明文化对人影响的冲击力有外显的,也有内隐的,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内隐层面的东西,因为它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3.文化具有统一性和方向性。文化需要共识,共识是对其所宣扬的价值观的认可。北京精神的宣传就是要形成北京民众的价值共识行为,使北京精神发扬光大。价值共识行为体现了文化的塑造力和制约力。

4.文化具有多元价值。先进文化具有建设力,落后文化具有破坏力,不同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但是,先进文化要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例如,“小悦悦事件”所引发的对“见死不救”的讨论,涉及了文化道德问题。正面文化需要扶植,负面文化不制约就会渐形气候。当正不压邪时人们的行为就会出现道德顾虑。

5.文化具有层次性。最高层次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需要通过教育与宣传来达成共识,落实于行为中,才能得以传扬;第二层次是社会特征所确定的价值观,由六种社会价值观构成:政治型、经济型、审美型、社会型、科学型、宗教型,随着不同时期社会倡导的价值不同社会文化会发生转化,例如中国社会价值观随着改革开放由以政治型价值观为核心转化为以经济型价值观为主导的价值观;第三个层次是个人价值观,是由个体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成分所组成,情感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如亲情、爱情等。三个层面的价值观都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但是所起的作用不同,因人而异。

6.文化具有适用范围。不同领域都有着自己的特定文化范畴,即文化的适应范围。例如,学术文化和官文化各自有其作用范围,如果一种文化不适合地生长在另一个文化领域中,就会出现冲突。官文化如果在高校发挥了主导作用,就会出现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与学术文化产生巨大冲突,制约学术发展。因为官文化强调的是权力的东西,比学术文化的力量更强大。

文化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文化建设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又艰巨的工作,需要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需要各个机构的有效运行,需要民众百姓的积极响应。

杨宜音(中国社会科学院)

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走到一个非常崭新的阶段了,我们看到好多值得关注的事实和现象,总结起来我觉得有四句话非常有概括性,这就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现在讨论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时候,要知道这个战略的提出是基于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走过新的阶段来做出的,在这里我就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三年社会主要的变化。

从经济体制和结构改革这方面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GDP增长非常快,现在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已经出现了。根据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测算和分析,我们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到了工业社会。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的格局,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个变化也带来了职业

群体结构和阶层结构的变化。职业类别上有了很大变化,而且收入状况、文化水平、消费结构、人际交往、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各个方面都随着在变化,中国社会形成的职业结构群体可以分成十个阶层,形成一个上下结构。这个结构的分化和企业群体的多样化又导致了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化,这样使利益分配不均,社会矛盾严重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所以,我们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国家到了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国家。

我们看城乡结构也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最近正在筹备一个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的高层论坛。通过筹备这个会议我们了解到,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城镇人口只有5700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从1978年到2011年这32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多上升到接近50%。人口的结构也因为我们的人口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降低了生育率,但是同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步入老年社会了,核心家庭是我们整个家庭结构的主要模式,代际结构的变化也变成了我们城市人现在开始熟悉的“4-2-1”的形式,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对家庭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挑战。

在这些变化下,社会组织也在变,原来我们最熟悉单位制现在已经式微。很多人的生活慢慢从单位走向社区,走向社会,现在已经有60%以上的从业人员是在非单位制的组织中工作。社会分层和流动也发生了变化,大家都知道特别明显的现象就是农民工现象,或者叫进城务工人员现象。以前我们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主要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个基本阶层,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阶层结构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以及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房屋拆迁,农民失地问题的凸显,直接导致了官民关系、劳资关系、地区关系、城乡关系的紧张。所以,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增长很快。

另一方面,我们看社会流动的情况,整个社会结构慢慢稳定,社会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通道不是很畅通。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被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断裂”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蚁族”、“蜗居”、“考碗族”等现象。发现社会矛盾不是局限在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年龄段,或者是特殊的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国家、市场、

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在进行调整。例如,在讨论农民工的问题时,我发现农民工的问题反映了整个社会变迁的很多关系,比如官民的关系、城乡的关系、贫富的关系、地域的关系,等等。可以说,很多现象和现实问题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我们从整个经济社会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在心理层面,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也有非常多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刚才杨玉芳老师提到的价值观的问题,比如我们说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盛行的问题,还有道德缺失(典型的是,老人摔倒到底扶不扶都成为整个社会要讨论的问题)、诚信缺失、工作和生活压力的增大,生活中风险、不安定因素的增多,社会网络慢慢地从熟人社会到生人社会,社会支持网络在缩小,社会归属感、社会的认同感都比较弱。我们的社会价值观、社会舆论在整合社会、引领社会发展的功能上都是值得进一步去讨论和发现它的问题。这些就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或者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研究中,都不得不面临的社会转型的背景。这个转型和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布兰妮提到的“大转型”的概念非常相似,也就是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整个冲击了原有的社会秩序,走向一个社会重构的过程。

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心理学家应该提高对社会转型历程的敏感度,应该全面的讨论社会转型时期,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来揭示个体、群体和社会变迁之间相互的关系,探讨我们这个文化在大变革的时候重新建的方式。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个决定正确地指出了文化对社会发展具有的引领作用,它提出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要协调发展,我也特别期待可能将来中央的工作会议能有一次社会心理学的工作会议,或者叫做心理建设的决议。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方略》里就提到心理建设的概念。我认为,心理学真正的春天已为时不远了。文化建设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因为在这个方略里提出了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这个提法就给心理学家服务社会提出了很现实的、新的任务。

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我们也要抓好几项工作,第一是加强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形成好的

学术氛围,我们要为学者搭建好的优秀的学术交流平台,促进更好的学术成果问世。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相比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比较年轻的学会。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像今天这样,几个相关学会一起来共同讨论我们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引导我们的研究人员和心理学工作者能够用一种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关注这几个学科,来推动这方面的讨论。比如说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中央在很多文件里已经提出来这个概念,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表述,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社会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和个体的价值观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测量了解,怎么来引导,这些都是非常急迫的研究问题。还有社会心态的现状和调控等很多很具体的社会心理研究的领域,都是可以和这个主题联系起来的。

另外,文化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也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文化和社会转型应该是我们社会心理学家牢牢抓住的两个基本点。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特别思考了文化真空(cultural vacuum)、文化贬值(cultural debasement)以及文化不适应问题,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 1998)。他看到,“中华文化可以提供一个道义的基础,从文化自觉到中西文化的交汇,以经济为先导,形成一个有道义基础的世界共同体”(费孝通, 2005)。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主动承担起认识自己文化及其定位、认识不同的文化及展开跨文化对话的任务”(费孝通, 2005)。费孝通先生的思考,对我们社会心理学工作者极富启发意义。发展文化社会心理学,开展中国文化心理的研究,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文化交流与融合作出理论上的贡献,也是时代为心理科学工作者,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咨询专家等提出的很高要求。我想我们应该特别抓住社会变迁和文化强国战略的机遇,让我们的学术能

够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最后,我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会预祝这次研讨会能够集思广益,形成共识,摸出创新的初步的路径,为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心理建设贡献力量。

张平(国际关系学院)

我所在的学校没有心理学专业,但是,在心理学教学和科研之外,我们也做了很多定向单位和相关社会组织的心理学知识普及和推广工作,深切感受到国家机关公务员尤其是政法队伍对心理学的需要。尤其是最近几年,很多政法部门重视干警心理健康、重视机关的心理建设,但是,在具体方法、切入点等方面还需要更多的专业指导。而作为心理学的专业工作者,也有很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内容。

关于具体的做法,我们这几年有以下几个切入点:因应公务员对心理学知识的需要,广泛开展心理学普及的讲座和读物推荐工作;二是刚才樊富珉老师讲到的MAP,就是针对领导干部,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岗位的干部和一线业务工作主要领导干部的心理服务,协助思想政治工作者真正了解人,了解人得需求,有针对性处理问题,协助领导干部找到管理和处理自己压力和负性情绪的方法,以协助提升其领导力;三是心理卫生及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及时有效处理一般心理问题,对心理疾病患者及时予以相应的医学介入,以避免危害工作和危机事件的发生。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的以上工作,得到相关部门和广大干警的一致认同和积极反响,在机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觉得确实需要像今天这样的更深入的研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我相信,这样的研讨对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开展,一定能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

刘正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我想就结合近几年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一些工作谈一下机关文化。总的来说,中国的机关文化具有很强的独特性。首先,中国传统的官文化渊源流长,直接影响机关文化演进。传统官文化中的“人治”、“愚民而牧之”、“官财一体”等思想,虽历经新文化的洗刷,但是,它仍以习俗和历史的惯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机关文

化中;而新时期的机关文化是以人为本、民主、科学为基石。在我国现实情境中,这两种迥然相异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我国的机关工作人员。其文化内在冲突必须将在具体的机关工作人员心理上表现出现。其次,机关文化的求同倾向非常强,是极为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文化。高度的求同倾向,特别是向上级高度求同,保证了机关工作的高效率。同时,其本身也给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得个体文化没有适度的空间。第三,机关文化是典型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在我国,进入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是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一点,我国与美国不再,在美国,大学毕业中精英人才主要是流向企业;而在中国,大学毕业的精英人才刚主要流向各级公务员体系。从每年公务员招考中可见一斑。

由于机关文化以上几个特点,使得机关文化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强势的文化,进而挤压了其他亚文化的表达。例如,一些机关领导强势行事的作风,往往会不经意中带入家庭文化,对家庭关系和生活带来了影响。近几年,机关工作人员咨询的案例中,这类问题占了很大部分。另外,一些领导在面对大众时,以一种强势或优越文化的姿态,并毫无觉察的情况下,将机关文化下的方式应到与大众对话和沟通上,结果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出现,“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这样事件。

对于身处独特机关文化中的个体,如何更好地适应机关文化也是需要关注话题。从心理学来看,文化的适应不仅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也发生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亚文化之中。从现有一些咨询案例来看,个人适应机关文化基本有四种结果:一是被边缘化,不被认可和接受;二是纠结倾向。个人自身的个性、教育经历和机关文化不能很好地融合,不断地出现自我冲突;三是回避与隔离。个人的经历与个性很难融入机关文化,采取自我保护,即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最后,整合与灵活。快速调整自己,相互融合,适应机关文化,并为机关文化注入新的血液。

致谢:感谢本次研讨会的承办单位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卢敏、姬利敏、张金凤、冯华萍对文稿的初步整理和修订。